

《纽约时报》对中国雾霾的报道特点及外宣应对

侯晓素 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

近几年，“雾霾”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大“热词”，雾霾天气频发，不仅牵动着国内民众的神经，也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国际媒体争相对其进行报道。当代社会，国际新闻媒介的报道，尤其是西方主流媒体的新闻和言论中所呈现出的虚拟形象，对于一国国际形象的建构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研究西方媒体如何反映和解读中国雾霾问题，对于我们有的放矢地开展雾霾等话题的对外报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了解外媒所呈现的中国雾霾镜像，笔者选取美国代表性媒体《纽约时报》2013年以中国雾霾为主题的报道进行研究，并提出中国媒体的应对之策。

《纽约时报》2013年有关中国雾霾的报道

通过专业数据库检索发现，2013年《纽约时报》共发表以“中国雾霾”为主题的报道38篇。报道所涉及的主要议题有：污染状况（37次）、危害和影响（22次）、原因分析（10次）、治霾政策和举措（8次）。就报道内容而言，《纽约时报》的中国雾霾报道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重点聚焦中国雾霾的严重性和危害性。38篇报道中几乎每一篇都在直接或间接强调中国雾霾的严重程度。有过半数的文章重点提到雾霾会导致人类患病、寿命缩短，尤其是严重威胁婴幼儿健康，此外还会影响正常的生活秩序，甚至使邻国深受其害等。

少数文章对中国雾霾的成因进行了分析。被提及较多的原因是经济发展方式和政治制度，也偶有文章认为是受到地形和特殊气象条件的影响，但会注明这是中国政府或媒体给出的解释。

对中国政府应对举措的关注度较低。相关报道中几乎每次提及，落脚点都是转而强调“政府迫于民众压力而为之”，客观评价寥寥，反倒一再对中国治霾举措的有效性提出质疑。

外媒对中国雾霾的“误读”和“偏见”

笔者在认真研读了《纽约时报》的报道后发现，其并未如实客观地报道中国雾霾问题，而是带着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固有偏见剖析中国环境问题，带有较大程度的“误读”。

对雾霾状况的描述带有渲染成分。《纽约时报》对中国雾霾问题的报道并没有恪守西方媒体所宣扬的“客观平衡”原则，而是存在明显渲染夸大的成分。其报道中频繁使用“骇人听闻的”“糟糕透顶的”“无法形容的”“高危的”及“末日般的”等带有强烈感情色彩且极端负面的词汇凸显空气污染的严重程度。甚至还有记者结合自身经历称，“在被派往中国之前，我在伊拉克做了三年半的记者。在那里，外国记者们不停地谈论各种可能致人死亡的方式——汽车炸弹、枪战、被绑架后遭到斩首。我在这些威胁中活了下来，却发现现在自己在揣测：生活在中国是否正对我和我的家人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这里的环境危险太厉害了，而且其后果可能会在数年甚至数十年后才显现出来。”如此言过其实又带有渲染性的描述会对受众心理造成极大冲击。同时，《纽约时报》还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对中国雾霾相对理性的解读以及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片面选择负面事例和观点，并反复强调，用以证明污染的严重性和危害性。这种看似简单的处理却极大地强化了表达效果，无形中使其报道中暗藏的倾向性左右受众的认知。

对中印空气污染问题区别对待。印度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在很多方面与中国具有相似性，而且印度现阶段也面临着与中国相似、甚至比中国更为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印度斯坦时报》曾援引美国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2014年初出炉的“全球环境绩效指数”称，“按空气污染水平排名，印度在全球20大经济体中排在倒数第一，印度和中国是世界上PM2.5平均值最高的国家。”然而，让人奇怪的是，《纽约时报》却没有像“紧盯”中国

雾霾一样去关注印度的空气污染问题。笔者以同样的方式和渠道检索发现,《纽约时报》在2013年只有一篇关于印度雾霾的报道。尽管这篇名为《你认为北京的空气糟糕?那去新德里试试》的报道也承认,“新德里的空气污染水平不止一次远超北京,且印度政府对此无动于衷。”但《纽约时报》不但没有对印度政府的“不作为”提出更多的批评和指责,甚至没有像对待中国一样紧紧揪住印度空气污染问题不放。不知其“醉翁之意”是在雾霾本身,还是在有意针对中国?

存在环境问题“政治化”的倾向。研究《纽约时报》的报道发现,它很容易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在中国,空气污染并非单纯的环境问题,而且属于敏感的政治议题。该报多次从权力斗争和党内腐败等政治视角解读中国雾霾问题,甚至直接将雾霾产生的原因及解决的障碍归咎于中国的政治体制,认为应该为中国的空气污染等环境问题负责的是“一党专政”。美国社会学家赫伯特·甘斯在30年前就指出,“(美国媒体)对于国际新闻的报道通常不会严格遵循客观与超然的规则,而且在国内新闻当中会被认为是不合理、不恰当的鲜明价值判断却可以出现在对世界其他地方,特别是共产主义国家的报道中。”^①这似乎也从另一个侧面验证了,在解读中国雾霾问题时,《纽约时报》未能摒弃对中国政治制度和中国共产党所持有的刻板印象,而是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偏见。

主动掌握话语权,消解外媒之“误读”

《纽约时报》对中国雾霾的“误读”式报道无论主观目的和背后的真正原因如何,客观上都将有损中国的国家形象。为破解当前不利局面,中国媒体需主动发声,掌握解读中国环境问题的话语权,对外说明为雾霾所困扰的中国真实状况。

主动发声,及时说明空气污染状况。环境问题作为一个全球性问题,直接关系到人类的健康和安,传播不当极易引发社会恐慌。我们的报道不仅要讲究时机,还要关注传播的方法和技巧。中国现阶段的确面临较为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这是身在其中的每个人都能真切感受到的。对此,我们没有必要刻意地遮掩回避。而是应该主动发声,及时对外说明空气污染状况。以此赢得外界的信任,掌握引导境外舆论的先机。如果中国政府和媒体未能及时、有效地提供权威信息、说明事实真相或对外界疑虑进行有效回应,一些西方媒体发出的不符合事实或不负责

任的报道,甚至恶意散播的谣言就会借机而入,对我造成不利影响。负面影响一旦形成,再想扭转将非易事。

平衡报道,全面阐释治霾举措和成效。近几年,中国政府对环境问题展现出前所未有的重视,尤其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执政后,不仅多次公开表达了治理环境的意愿和决心,而且相继推出一系列力度空前的政策和措施来应对空气污染等问题。对此,《纽约时报》却很少提及,而且在少数几篇相关报道中,也是带着有色眼镜审视和评论中国政府的行为,认为是其迫于民众压力不得已做出的让步。《纽约时报》选择性忽略淡化或歪曲误读中国治霾举措及治污进展的做法短期内或难改变,而我们能做的就是改变自己。我们在对外报道雾霾问题时,要确保全面、客观和平衡。避免仅仅停留在揭露和反映问题的浅层次,要注意挖掘污染的深层次原因,并全面解读、阐释雾霾原因及中国政府的治霾政策和举措,以填补外媒报道留下的空白,让国外受众更为全面和客观地认识中国的环境问题,进而扭转外媒“误读”对我造成的不利影响。

提升专业性,确保报道的真实和准确。“信息传播失当,同样有可能引发国家形象危机”^②,不论是媒体有意为之,还是由于新闻工作者缺乏专业知识所致,有失规范的新闻报道的传播不仅会误导受众,而且会授人以柄,引发外媒炒作,最终沦为其批评或丑化中国的工具。《纽约时报》2013年11月6日的一则报道中就提到了一个有关中国媒体炒作本国雾霾的例子。文章称,中国新闻网站根据《2013年气候变化绿皮书》发表题为《气候变化绿皮书称雾霾会影响生殖能力》的报道,受到国内媒体的广泛转载,而且仅新浪新闻门户网站上转载的一个版本就被评论了上万次。其实,该《绿皮书》重点介绍的是近50年来中国雾霾天气的总体情况,关于其对人体健康尤其是生殖能力的影响只是顺带一提,而国内媒体却避重就轻、断章取义,发表了不够规范的报道,最终落为外媒的口实。因此,中国媒体在对外环境报道中,要提升专业性,确保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绝不可为吸引眼球或博取外媒“夸赞”,刻意制造噱头,扭曲事实本身。☞

〔注释〕

① 赫伯特·甘斯:《什么在决定新闻》,石琳、李红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9页

② 程曼丽:《国家形象危机中的传播策略分析》,《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3期

责编:李倩